

（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道路”	程映虹
【史实辨析】	煤炭部长张霖之因何而死？——揭穿戚本禹的避罪谎言	张光渝
【档案解密】	对一份后文革年代资料的多重解读 （三）	张 比·孙 耘·唐少杰
【各抒己见】	我们今天怎样看待文革和毛泽东？	王希哲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道路”

• 程映虹 •

〔摘要：民族主义是贯穿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主题，但它在有关文革的讨论中至今为止基本缺席。本文探讨了导致这种缺席的理论和历史原因，对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党国家民族主义作了进一步分析，并以科学领域的一些重要事件和讨论为例提出一个观点：文革时期的民族主义有别于一般意义和形态上的民族主义，以标榜中国特殊性和中国特色为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文革时期的那个民族主义一脉相承。〕

讨论中国近现代史，从19世纪晚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主义一直是重要主题，但引人注目的是文革时期的基本空白。关于当代民族主义，一般论者似乎都认为是从文革结束后开始的，经历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逐步复兴，到九十年代进一步强化，和国家主义相结合并发展出一整套以中华文明特殊性和中华民族优越性论证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言说。中国现体制和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当今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因素。

◇ 民族主义——文革研究中的盲点

为什么文革时期的民族主义没有引起重视和讨论？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因为和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当时民族主义不重要，也就不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讨论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时，一般来说对阶级话语的重视要远超过民族话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近代民族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统治民族的利益化身，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中，从列宁到斯大林和毛泽东，原则上都不承认超阶级的全民的民族主义。他们认为国家首先是阶级的国家而不是民族的国家，其实质首先是阶级专政而非民族利益共同体。作为对多民族国家客观现实的承认，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民族平等和团结的理论基础是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利益的

一致。在这样的理论和政治背景下，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和词汇一般很少以正面的意义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政治术语中，尽管在实践中民族主义情绪和心理始终在国家政治中发挥潜在的作用。甚至爱国主义在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具有凝聚力的官方意识形态口号，有时甚至为了发动政治运动而被滥用，例如文革发动前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武训传》”。那篇文章的目的并不在于爱国主义宣传而是在文艺领域发起政治斗争。

文革更是毛时代阶级话语登峰造极的阶段，除了以上比较一般和抽象的理论原因之外，这一时期民族主义之所以不被重视还有特定的历史因素。首先，文革时期，尤其是到70年代早期为止，中国奉行的是世界革命路线，向外输出革命，这个总的战略难以在民族国家这个框架内存在和发展。当时的世界革命除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外，具体内容更多地是向世界推广毛主义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经验（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总的来说都和民族主义高扬的国族身份和国家利益在理论上难以兼容。在实践上看，文革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很多是牺牲本国利益的，如不顾本身困难大规模无偿外援，在领土问题上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友好邻国的退让，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以是否有利于世界革命而非民族利益决定自己的政策。

其次，在世界革命这条路线的主导下，文革时期的中国闭关锁国，对外的国与国关系不但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被置于反帝反修和反对它们在世界各国的代理人这个背景下，中国不但和很多国家无法正常往来，而且和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关系也受到巨大损害，有的被中止和降级。这种政策和它的后果无疑违背了民族国家起码的自利原则。以上两条综合起来，是文革时期中国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单位的国际社会共同体中身份定位的模糊甚至混乱，这在理论上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冲突的。

再次，在国内政策上，文革期间，自中共建政以来就确立的以社会阶级作为个人主要身份（这里就主要民族汉族而言）的身份政治发展到了极端，“中国人”这个自晚清以来在国族建构中逐步形成并在对外交往和民族危机中强化的个人身份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基本失去意义。个人的自我定位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联系不但完全取决于出身、阶级、等级、职业和户口，也取决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给很多人的政治身份带来的新变化。而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又使得一般只有在正常对外交往中才能被充分感受的“本国人”/“外国人”和中国/世界之差别意识基本缺位。总之，用国际上一般考量一国国民的国族身份意识的标准来看，说文革是近现代史上中国人国族身份意识最淡薄的时期应该是有根据的。一个国族身份意识淡薄的时代当然不会是一个民族主义旺盛的时代。

当然，文革时期也不乏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和意义的历史事件，有的事关民族利益，有的事关民族尊严。例如美国飞机入侵中国领空数百次，中苏边界冲突，华侨在海外受迫害在国内引起的反响，等等。但对这些事件的宣传首先都是放在世界革命反帝反修这个意识形态框架内，而非基于超越阶级和党派的民族国家的立场。中美和中苏矛盾固然如此，海外华侨受迫害也常常因为他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战士，是忠于毛泽东，即使提到忠于祖国也是“社会主义祖国”，并非因为其“中国人”的身份。受到类似宣传的还有1967年中国学生大闹莫斯科红场事件。在林彪出逃事件的善后宣传中，“叛党”罪一开始就重于“叛国”罪，和大张旗鼓对他“形左实右”的揭批相比，基于民族大义的谴责处于次要地位。在台湾问题的政治宣传上，也是“解放”在前，“回归”在后，“革命”重于“统一”。所以，当时民族主义更多是用红色（毛主义革命）而非黄色（借喻族群或国家）话语来表达的。

如果从以上方面来评估，在文革的政治话语尤其是政治实践中，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确实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是对外的世界革命论和对内的不断革命论，这两个

革命在理论原则上都难以和民族主义兼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虽然有它基本的超越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内涵和概念，但在各国的历史过程中却很少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运动，都是依附于或者至少借助于反映社会性质和制度特色的意识形态。例如美国建国时的民族主义就和自由、民主和联邦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法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也是将共和的政治制度和自由人权的意识形态视为法国民族的象征；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二次大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分别被纳粹种族主义、天皇制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国家主义支配；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又和采用何种政经制度（西方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主义的、本土的或是混合性）的道路选择纠缠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放在中国特殊的国家体制下来看，其表现形式就要复杂得多，官方意识形态的很多内容其实就是这个体制下的民族主义的表现。

#### ◇ 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民族主义

后冷战和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学术话语已经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族主义从新的角度提出了评估，突破了以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仅仅从阶级的角度认识民族主义的框架，可以对我们讨论文革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提供参考。例如，徐迅的《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用“政党国家”的概念来分析作为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独掌国家政权的政党通过革命时期的动员组织和革命后的行使国家权力，第一次把分散在疆域内的众多族群在政权、社会、文化和心理各个方面（应该包括的还有国民经济）实现了高度整合，完成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确立为全民族所认同的统一的文化和价值观。“统一的政治体系，统一的文化体系？？？统一的集体行为，构成了统一的集体身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概念。”〔1〕在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对于一般的民族国家来说，国家主权首先是领土完整和国族统一；但对于政党国家来说，意识形态和相关的国家制度是主权的核心。

所以，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民族国家”和“国民认同”这些名词，但它们反映的民族国家的现实和其成员的共同意识还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说，政党国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了这个特殊形态的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所熟悉的毛泽东时代国家政治的很多特征其实就是政党国家建立、灌输和强化其国民认同和国民意识的手段。不过和其他民族国家相比，这种认同和意识的核心并不是国族的文化历史语言风俗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心理，而是一种外来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本土化，是一个在国族传统中基本没有根基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符号系统。正因为此，这个过程的展开既不依赖传统的自然延续也不借重社会自发的参与，而是依靠国家权力通过政治革命、制度安排、社会动员和意识塑造全方位推行，其举措可以包括从思想改造、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诲到国家安排甚至强制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等等。人口迁移政策的合法性就是“国”的疆界内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任何个体“国民”的“家”这个民族主义的空间维度。另一个具体的例证是祭扫革命烈士墓在那个年代的制度化和高度仪式化，尤其是在学校和青年群体中。祖先概念是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时间维度，中国民族文化更重视祖先和后辈之间的联系。政党国家大规模祭扫先烈墓就是期待在全体国族成员的意识中建立起一个高居于个人家族先辈之上的由政党国家成员共同膜拜的“祖先”地位。此外，领袖崇拜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政党国家国族象征的极度偶像化：国族成员通过仰望领袖形象和想象自己和这个偶像之间的共同关联而建立起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大家庭共同体意识。

这样一种特殊形态的民族国家，其主要特征基本上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享。而文化大革命其实在各个方面是以上所有特征的极度强化。所谓“文化”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革就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政党国家成员的认同意识和心理。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们在腐蚀和瓦解这个共同体的认同基础。文革中的很多极端行为正是在强化

和纯化这个共同体的名义下产生的，最突出的是在国家权力之外对被认为是这个共同体的异己分子的群体暴力和民间肆虐，这和很多国家发生的种族清洗和族群迫害在心理和行为上如出一辙。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也是为了强化这个共同体意识。“忠于党忠于领袖”这个概念虽然在此前的革命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但那只是对革命者的特殊要求，而在文革中却成了政党国家每个成员不但在政治意义上而且在道德甚至心理意识上的标准，其普遍性只有民族国家成员对民族国家的效忠才能相比。

#### ◇ 中国道路——文革中的民族主义

以上讨论提供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特殊的政党国家民族主义的一些概念和思路。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在文革时期其实并没有完全退出意识形态的舞台，只不过是表现于那些一般的讨论民族主义的术语和概念或许难以概括的形式。本文意在进一步推进这个讨论，从当今中国崛起语境的角度回溯历史，从中辨析文革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及其影响，将文革时期的民族主义和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相联系，指出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打通“两个三十年”。本文认为，除了上述“政党国家的民族主义”这条途径之外，认识文革特色的民族主义，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宣传中对文革开辟的中国道路的阐释和文革建立的中国独特性意识的高扬来实现。这种政治话语和前文所述的两个革命（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话语共存并相互渗透，而在那两个革命话语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它们在今天对于“中国道路”的叙述和论证中继续发挥作用。

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有一段为人熟知的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地爬行。我们要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这段话是毛泽东执政时期就大政方针而言阶级斗争色彩最淡薄的一段话，其中最关键的是“打破常规”和“建设强国”。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尽管是就科学技术问题发言，但表达的是毛建国后和国际上一般民族主义最接近的思想（虽然在他那里这个民族主义不但没有被明确提出而且始终受制于他的两个革命论）。毛泽东的这个以科学技术为突破口，“打破常规”来“建设强国”的思想在文革和后文革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挥，至今成为以“中西对立”为基点，以“中国经验”挑战人类共识的发展模式的思想基础。

放在这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如果我们承认今天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最核心的内容，那么，文革时期的民族主义就需要从一些被忽略的历史事实中发掘和阐释，它和今天中国崛起和强国论之下的民族主义其实有内在的关联。所以，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但在于对文革的更深入的思考，也在于了解今日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形态和历史连续性。

#### ◇ “中国科学”对抗“西方科学”

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意义上的文革式的民族主义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毛主义理论家对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讨论和一些重要事件，这是文革研究至今没有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值得一提的首先是可以称之为“层子模型”的中国式基本粒子理论事件。1965年，在文革酝酿期间，中国科学界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北京基本粒子小组”，由近40位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地区一些大学的科学家组成，要用以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猜测为指导，在最短时间内提出一个基本粒子理论模型，向国际推广。从1965年秋天到1966年初夏，这个小组的成员在中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42篇论文，产生了一个“中国”的基本粒子理论模型，取得了“伟大胜利”。主持这个会战的科学家钱三强把它命名为“层子”，意为按照毛泽东的“光辉思想”，微观物质世界是可以一层层无限地分下去的。

尽管那个“层子”模型只不过是中国科学界的自我期许，并未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受到承认并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是美国科学家个人研究而非集体“会战”得出的夸克模型），但这场围绕“层子”的讨论显示了科学为具有毛主义特色的中国民族主义服务的功用。这是毛主义体制下中国科学界对国际上当时面临重大突破的基本粒子理论的直接反应，企图用一些在大型科技和工业项目（如原子弹和大庆油田）中获得成效的“会战”这种中国式“打破常规”的方法，不顾中国科学整体严重落后的基本状况，开辟一条参与甚至主导世界最前沿科学的捷径。此外，这场讨论是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下开展的，这是“中国特色”在当时最核心的内容。（2）

文革开始后，1966年7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陶铸、和陈伯达出席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并发言，其中陈伯达的讲话对于本文的论题非常重要，对其中重要段落完整摘下：

大家知道，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始的，从东方转到西方，现在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东方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没落了。东方的文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在东方起来了。世界的文化转了一个圈，来了一个往返，先东方后西方，现在又回到东方了。在东方起来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高得多。这个新文化的创造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几百年来是个落后的国家，如刚才江青同志说的，中国人被看成是“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了，我们有很大变化，有很大成功，现在成了世界上的强国，包括美国和赫鲁晓夫在内，也不能否认。有人估计，再过二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也许不要二十年，只要按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努力，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中国无产阶级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破除对洋人的迷信。资产阶级是封建主义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当洋奴，做外国人的奴才，他们很以为当洋奴是很光荣的事情。鲁迅曾嘲笑他们说：“月亮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创造性。所以，现在是破除对古人，对洋人的迷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创造性的人民，解放后十七年来，这种创造性使中国变成了伟大的世界强国，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距离人民的要求，毛主席的要求还很远，毛主席要求我们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水平，我们现在不但赶上，而且有超过的苗头。现在应该把这一点看成最大的任务，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是从“超”字着眼呢，还是从“赶”字着眼呢？我赞成从“超”字着眼。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中，反得其下；取法乎上，反得其中。”我赞成超字派，从超字着眼，很快就能赶上，只从赶字着眼，就很难超过。对吗？（全场回答：对！）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促进赶超精神，首先从“超”字着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敢想敢超，就敢于与修正主义斗争，就能创造西方和苏修所不能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新文化，就能取得胜利。在科学方面，我们不能超过所有的古人、洋人吗？（全场回答：能！）（3）

江青的讲话摘要如下：

我们是一个大国，所以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又是一个弱国，解放前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弱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因此，自卑心理是很严重的。帝国主义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是“低能儿”，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坚决驳斥他们，粉碎他们！

过去，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把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事，都让外国人去搞。认为只有外国人才搞出来。你们知道，去年上海青年工作者用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又叫人造蛋白。这东西

发明后，就被资产阶级权威贬低了，说：“这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明”。他们不承认这项发明。后来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承认这项发明有很高的水平，经过斗争，今年才公布了。在这里，我向青年科学工作者致敬！向工农出身的科学工作者致敬！

我想讲的就是这些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群众，我们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超过其它国家，把我国变成世界上强大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雄心大志？（全场回答：有！）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明我们有这种可能性。（4）

陈伯达和江青的讲话之所以重要，不但因为它们系统地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的分野，在科学领域贯彻了文革阶级斗争的路线，而且因为它们的内容和思想上超越了文革时期特定的政治和权力斗争的纠葛，揭示了文革（主要是文革但也包括文革以前）话语和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意识之间的连续，也显示了它和当今的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话语的深刻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概括陈和江的讲话，有这样几点值得强调。

首先，文革指导性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强国话语竟然有内在的一致性。强国话语文革前就已经存在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第一次比较正式比较系统地提出是在1957年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后来多次在各种场合下出现。但这样一个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政方针为什么始终没有成为中共主流政治话语，按照陈伯达和江青这里的说法，是因为窃取了科学研究大权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西方和苏联的代理人，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处心积虑阻碍中国发展，只要他们掌权，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就要发动文革、打倒这些权威、把科学文化大权从他们手中夺过来。在陈伯达和江青的阐述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话语就和民族主义的现代化的话语连接上了：反修防修是为了强国，甚至造反夺权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是“曲线强国”。

第二，文化大革命不但政治上是强国之路，而且在科技发展上也是强国之道，因为它为落后的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技术开辟了捷径。陈伯达和江青强调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崇洋媚外，蓄意否定和压制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企图让中国永远跟在西方后面爬行。文革就是为了打破这些权威对科技文化的垄断，让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陈伯达和江青的这些论断无疑和毛泽东本人对教育、科技和文化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民粹主义的观念——实践出真知，人民大众不但政治和道德上高于知识精英，甚至在智力和知识上也比他们优越。陈伯达和江青的言论是文革中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一个例证。为了说明问题，江青引用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事例，说它是工农出身的中国“青年工作者”的成就，但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故意忽视和压制了。这完全是罔顾事实。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科学院的资深专家自1958年开始的项目，参与的科学家有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和沈昭文。其中三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医学博士，另外两人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博士。江青对胰岛素研究中有西方教育和训练背景的专家的作用的完全抹杀和对本土“劳动人民”智慧和才能的虚构，在文革对中国科技成就的宣传中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破除对西方科学和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了很多科学和技术难题，中国成了科学上遗世独立的一块“神奇的土地”。

第三，陈伯达的世界文化起源于东方在西方绕了一个圈现在又回到东方的说法是文革话语中最超越当时政治现实的，但也是对文革最高的赞美，和今天中国崛起的民族主义话语最接近。陈首先虚构一个世界文明史上东西方二元论的对立，中国代表东方，认为它本质上就比西方优越。放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观点可以说非常滞后但又非常超前。滞后是因为它重复了1949年以后在大陆消失的晚清和民国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关于中

西文明孰优孰劣的老调；超前又是因为这个文明二元对立论在今天中国思想文化界再次走红，为官方中国特色论和中国制度优越论寻找历史依据。这个东西文明论的核心包括强烈的反西方价值观，我们甚至可以在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思想中找到它的对应。此外，中国自命“东方”，和整个西方对立，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大和对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漠视。这个“中国=东方”的观念在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述中更为常见，“东方”差不多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陈伯达受过旧学的熏陶，作为毛泽东的笔杆子和文革主要理论家，他多次公开宣传这个理论，虽然可能有借此显示自己比其他文革理论家都更高瞻远瞩的个人动机（他这些话无疑是说给毛泽东听的），但对我们今天从更宽广的历史的角度认识文革意识形态的思想来源应该很有启发性。

#### ◇ 造西方资产阶级科学的反

在陈伯达江青这次讲话之后，文革在中国科学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打出“中国无产阶级科学”的大旗，造“西方资产阶级科学”的反。这个“造反”既代表科学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又象征“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口号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所以它强烈的革命色彩中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底色。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科学领域的造反是文革形形色色的造反中最具有国际性的，因为它挑战的是国际科学界的“当权派”。“造反派”的主体是文革中夺取了中国科学院领导权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和中共建国后培养的红色知识分子，他们除了把各行各业在西方受过正规教育秉持正统科学理念的科学家作为对象，一个重要举措是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之所以被挑出来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一是因为他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对他的批判因此具有象征意义；二是因为相对论被认为是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相对立的马赫主义的科学基础，马赫是列宁专门批判的西方科学家，所以苏联科学界和哲学界也曾经开展过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基本不再提起。像文革中其他一些著名的大批判一样，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也是由所谓的“小人物”发动的，代表中国劳动人民出身和红色政权培养的知识分子起来造西方和本国资产阶级大人物的反（1967年，湖南一名数学教师周友华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此后数年中周一度成为科学界大批判运动中的风云人物）。〔5〕

陈伯达积极支持和推行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并把这个批判运动上升到他此前提出的东西方对立的高度，但这次他更明确提出运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中国对世界科学的领导。1970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的召集有关批相对论的会议上说：“过去科学是从西向东，从欧美到中国，将来中国要领导科学，为此要彻底批倒相对论。”〔6〕这个说法延续和发展了1966年他在科学院大会上的那个讲话的主要思想。

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的范围超出了北京，波及到一些省市的高校，是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科学界的重要事件，其“理论高度”和北京完全一致，例如四川大学的批判者在斗争相对论专家魏嗣銮的大字报中说对相对论的批判是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7〕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一直延伸到70年代上半期，以四人帮在上海主办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为主要基地，但讨论的内容涉及当代科学的其他前沿领域，其中对西方科学家根据1960—1970年代的宇宙观测得出的时空有限论的批判非常突出，批判者认为那是西方资产阶级宣布人类科学真理在他们手中已经“终结”了，而在“中国无产阶级科学”这里时空

仍然是无限的，“真理”没有终结。这个批判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后冷战初期曾经流行的“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也很类似：在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历史（或是意识形态）随着“民主”的胜利而终结了，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这种终极论的有力反驳。实际上，国际天体物理学的观测结果从来没有被西方科学家引申出科学真理已经穷尽的含义；而所谓“历史终极论”不但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读的概念，而且至多也不过是一个学派一个观点，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学界。对它们的郑重其事的反驳其实都出自以终极真理自命的理论体系的敏感。这种对其他理论之“终极意义”的过度解读和激烈反应表现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从文革至今的某种连续性。

文革期间这种“中国式科学”对抗“西方式科学”的虚构和宣传在一些应用型学科和领域中也有广泛的表现，一个例子是对大庆油田的宣传。作为中国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典范，大庆油田的方方面面都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在本文论题内就是充分体现了和西方甚至世界对立的中国特色。文革前就开始但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的官方对大庆油田的宣传中，在大庆找到大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8〕这个“中国特色”的石油生成理论就是石油的陆相生成假说，建立于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创造的地质力学上，它是和国际上占主流地位的海相生成理论相对立的。根据海相生成理论，中国不可能有大油田。海相生成论这个国际地质学界根据地质学的广泛现象得出的结论并非针对某个国家，但在文革对大庆油田的宣传中被政治化甚至阴谋化，被批为“中国没有石油”的“无耻谰言”，其目的是不让中国发展石油工业，从而无法实现能源独立。李四光是当时体制下享有崇高声望的科学家，他的地位无疑和被民族主义政治化的科学理论有关，其科学成就被说成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结果。另一个和大庆油田有关的重要人物是“铁人”王进喜。官方宣传中的王不但深信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论，而且能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找油。在以他为原型的电影《创业》中，他发出了“我就不相信，石油就都埋在外国人的地下。我们中国这么大，就没有油！”这样以国家民族为界寻找石油的奇想，和“别人嚼过的馍不香”这样的对“中国独创”的偏执追求。大庆油田开采过程中的很多技术问题的解决，例如钻井的角度，都被说成是“中国工人阶级”发挥革命主动性和创造性，破除了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亦步亦趋和墨守成规。

#### ◇ 结论

以上讨论了民族主义在文革环境下的一些和今天的民族主义特别有内在联系的表现。当然，文革含有民族主义内容的宣传中还有很多在改革开放后基本消失的话题，例如对洋奴哲学和买办主义的批判，强加在刘少奇头上的所谓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罪名，还有1974年的“风庆轮事件”（四人帮把交通部向外租船和买船诬为卖国）和“蜗牛事件”（江青说美国公司送给中方代表团的玻璃蜗牛是讽刺中国人跟在西方后面爬行）等等。尽管这些讨论和事件多半有高层权力斗争的背景（四人帮借此攻击周恩来），但这也正好说明民族主义在文革那个阶级斗争话语占压倒优势的时代仍然具有的政治能量。

广义来说，对于文革中产生的那些“新生事物”，例如“五七道路”、大庆红旗和大寨道路、教育革命、全民学哲学用哲学等等，一定意义上都可以从不但“革命”的而且也是“民族”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它们都是文革的中国要“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话语翻版）这些更宏大的话语的一部分，反映了毛泽东的中国要用文革来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一些制度性难题这个雄心壮志。文革宣传的一个常见题材是对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焕发出来的“首创精神”的赞美，从革命小将造反、上海公社的成立、到科学的突破和技术的创新，强调的都是从无到有，中国人正在不依靠任何前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世界奇迹。对于文革中的这些说法，当代民族主义研究完全可以把它们从阶级话语中剥离出来，在承认它们的阶级话



语和革命话语的主要性质的前提下，分析它们包含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正象当代的身份和性别研究完全可以从宏大的革命和阶级话语中抽出相关内容来分析一样。

今天回溯历史，文革中那些具体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内容多半都被放弃或淘汰了，但在它们背后的那种中国在世界文明中鹤立鸡群的自大，对中国肩负人类使命的自负，对中国特殊性的坚持，以及对中国与西方不但在政治制度上而且在人类文明的意义上难以调和甚至根本对立的强调，所有这些不但一以贯之，而且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为鲜明、执着并在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得到系统的表述。这是我们在思考文革的遗产时应该充分注意的。

作者简介：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注释：

- (1)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268—269页
- (2) 从50年代中期一直到去世，毛本人对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物理学证据非常关注。基本粒子、生命起源和宇宙演化是他最感兴趣的三大科学领域。有关这个问题和毛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之关系，见本文作者的有关中英文论文(Yinghong Cheng, “Ideology and Cosmology: Maoist Discussion on Phys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40, 2006, 109-149)和据此文翻译、改写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是宇宙终极真理”《领导者》2013年第五期。
- (3) 江青十年讲话汇编 [http://library.uoregon.edu/ec/e-asia/read/jiang\\_qing.pdf](http://library.uoregon.edu/ec/e-asia/read/jiang_qing.pdf)
- (4) 同上
- (5) 有关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的详情见胡大年“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一文。  
<http://www.cnd.org/CR/K08/cr468.gb.html>
- (6) 同上
- (7) <http://dodobook.com/index.php?id=books/shijianindexingzhuang/007>
- (8) 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 【史实辨析】

煤炭部长张霖之因何而死？  
——揭穿戚本禹的避罪谎言

• 张光渝 •

我的父亲，原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在文革初期因遭江青、戚本禹先后点名诬陷和恶意煽动而被关押批斗致死，成为文革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文革结束后，江青、戚本禹被分别判处死刑缓期和十八年徒刑。他们两人的判决书中都有诬陷迫害张霖之致死的罪名。

文革发动五十年后，戚本禹在临死之前完成了《戚本禹回忆录》，并在他死后不久在香港出版。作为张霖之的后人，我当然很关心戚本禹对迫害张霖之致死一事有何交待。

果然，《戚本禹回忆录》第三部分中有《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专门一节。戚本禹虚晃一枪，说自己对张霖之被批斗致死“负有重大责任”，“感到很内疚”，却用很大篇幅将张霖之之死与“矿难接二连三地发生”连在一起。他在该节一开始就说“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在屡遭批评后“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以至于在被毛主席点名“走资派”后，“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戚本禹回忆录》下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下同，第520—521页）

作为对照，戚本禹说，他在中办工作时看到矿难事件的“血泪控诉”，“都心酸落泪”，称矿难“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比张霖之更关心矿难事件和矿工的生命。张霖之“死官僚”（521页）的面目跃然纸上。

经过这一番铺垫后，戚本禹说，他的“责任”是在发动群众批斗张霖之的时候，忽略了张是一个“底下民愤很大”的人，“没有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因此被死难矿工的家属等人暴力批斗，忍受不住，“上吊自杀”。（520—521页）

我虽然对戚本禹的狡辩脱罪有心理准备，但读到这一堆公然的谎言，仍然十分气愤。戚本禹临死前，打着“内疚”的幌子抛出“责任论”，只有两个目的：一是逃脱罪责，二是继续诬陷张霖之。因为诬陷张霖之是逃脱罪责的捷径。

◇ 戚本禹的谎言包括如下内容：

谎言之一：煤炭部“一直不重视安全生产”——戚本禹的狡猾在于，他利用煤炭工业矿难事件的真实存在，抹杀包括张霖之在内的煤炭战线干部职工为煤矿安全生产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他要给读者留下张霖之枉顾矿工生命安全，煤炭战线事故“接二连三”并且一直没有改进的印象。

煤炭工业确实有矿难，张霖之作为煤炭部长，确实对所有矿难事件负有第一位领导责任。史上最大的一次矿难发生在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矿务局白洞煤矿瓦斯爆炸，时值交接班时间，造成680多名矿工遇难，震惊中央。毛泽东两次听取汇报，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参与指挥救援，军队也派出飞机运输抢险物资。这次事件中，压力最大、责任最大、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父亲。

当年的媒体没有报道这一事件。2003年，我以“俞虎”化名出版的我父亲的传记作品《共和国部长的挽歌》（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中，专门介绍了这次矿难。（《共和国部长的挽歌》215—216页）如果读者想了解更详细的史料，请查找何于清著《问苍茫大地》。

以白洞爆炸事件为转折点，煤炭部开始进一步清理大跃进时期盲目抓产量，忽视安全生产的错误倾向，痛定思痛，大力推进煤矿安全生产建设。在我父亲的领导下，煤炭战线推进“质量标准化”工作体系，以标准化保证工作质量和工程质量，以工作质量和工程质量保证安全生产。为此，我父亲提出了“安全是矿工最大的福利”的口号，下大力气改善煤矿生产面貌，扭转煤炭工业“傻大黑粗的”形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父亲曾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质量标准化工作，获得毛泽东的肯定，说：“看来质量是个命根子。”煤炭部一直坚持“质量第一”，“质量是命根子”的方针。直到文革前夕，我父亲身边工作人员夏方健提醒他，现在都在说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我们的这些提法有没有问

题？张部长告诉他这个口号是毛主席肯定的。又说：一个口号对不对，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不能简单理解。夏方健说：近几十年来，“这个口号在煤炭战线已经深入人心，纳入了安全生产规范。”（原《中国煤炭报》总编夏方健书面回忆）

1990年《中国煤炭工业年鉴》记载：由于狠抓质量标准化为中心的安全生产工作，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百万吨煤炭死亡率比‘一五’时期下降19.8%， “成为我国煤炭史上安全生产较好的一个时期。”

从局部看，根据山东淄博矿务局的历史统计资料，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淄川煤矿年百万吨死亡率高达40到50人，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降到1.87人。

“大跃进”期间，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只顾高速度发展煤炭生产，忽视安全工作，安全监察机构被削弱。1960年百万吨死亡率上升到7.1人。

1961～1963年，由于认真贯彻安全生产各项规定，落实局、矿、井三级领导安全责任制，恢复建立各种安全规章制度，推行“质量第一”的方针，开展质量标准化活动，安全生产状况显著好转。1964年百万吨死亡率下降为1.78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统配煤矿安全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安全监察机构被砸烂，安全规章被当作管、卡、压遭到批判，致使安全情况恶化。1970年百万吨死亡率上升为6.43人。（《淄博市情网站》[www.zbsq.gov.cn](http://www.zbsq.gov.cn)）。

无论从煤炭战线全局看还是局部看，1961年到1966年之间，煤矿安全生产形势都有了明显改观，成为我国煤炭生产历史上“较好的一个时期”。戚本禹所谓煤炭部对安全生产“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矿难“接二连三”的谎言不攻自破。

张霖之部长严格推行质量标准化工作，煤炭战线老职工、老干部有口皆碑。篇幅所限，他们的文字或口头回顾就不一一列举了。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六零后煤矿企业领导干部对张部长的看法。

2004年，河南鹤煤集团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厂长经理日报》记者为此专门采访该集团副总经济师张劲峰时，有如下一段对话：

记者：“请问鹤煤对质量是如何看待的？”

张劲峰：“我们煤炭采掘企业系统多、环节多、工序多、可变因素多，管理复杂，且时刻面临着水、火、煤尘、瓦斯等矿井灾害的威胁和影响，使我们对质量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没有质量，我们连正常的安全生产都不能实现。正如原煤炭工业部老部长张霖之同志说的那样：‘质量是煤矿的命根子。’我们把质量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人的质量保证作业质量，以作业质量保证工序质量，以工序质量保证工程质量，从而保证安全质量和产品质量。”

（《乌龙飞舞》，《厂长经理日报》，记者李丙驹，2005年2月1日）

有关张霖之部长和“质量是命根子”的内容，是张劲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主动提到的。这位大型国有煤矿负责人出生于1965年，也就是说，张霖之1967年1月被批斗身亡时，他还不到两岁。他这一代人仍然能知道原来有个煤炭工业部，煤炭部四十多年前有个部长叫张霖之，张霖之主张质量是煤炭安全生产的命根子，令人非常感慨。

但是，与张霖之同时代，直接策划将张霖之打倒并迫害致死的戚本禹却摇唇鼓舌，信口编造，颠倒黑白，把煤炭战线的安全生产成绩一笔抹杀。

戚本禹谎言之二：张霖之因矿难频发“民愤很大”被批斗致死——众所周知，张霖之是被江青、戚本禹以莫须有的“彭真死党”的罪名迫害致死的，这是典型的政治诬陷、政治迫害事件。但戚本禹却打着“内疚”、“负有重大责任”的幌子，通过回忆录把张霖之之死写成其因为枉顾矿工生命、矿难频发导致民愤而遭武斗身亡。这是一种既无耻又恶毒的狡辩，是戚本禹一贯的笔法和做派。

文革初始，我父亲与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一样，都受到了造反冲击，正常工作以至于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这固然有文革运动大势所驱，但也必须有具体的个别人物的挑头煽动。1966年9月14日、9月18日、10月18日，煤炭工业部一个司局级干部萧某连续三次上书中央文革，诬告张霖之“与彭真的关系不正常”，“是彭真死党”；又说他亲耳听到张霖之说“第一任真厉害，古时候的秦始皇，现在的毛主席”。（杨克：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28日）

我父亲就死于这两项罪名，而他本人直到被毒打致死，也没有承认这两项罪名。

戚本禹不仅是最早看到萧某告状信的人，而且是最早挑动萧某造反、攻击张霖之的人。早在1966年夏，戚本禹就嘱咐煤炭部造反派头目吴某（女）：“萧某是九级干部，有斗争经验，可以把他吸收到你们组织中来，给你们出主意。”。（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11月4日）收到萧某告状信后，戚本禹拿出“抓要害”的本领，点拨煤炭部造反派：同彭真的关系是“张霖之的要害问题”。萧某等人大受鼓舞，效忠表态：“我们要一鼓作气把张霖之的案定下来，以不辜负戚本禹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杨克：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

戚本禹是从一开始就幕后指挥打倒张霖之的人，选打手于先，抓“要害”于后，亲力亲为。但是，戚本禹却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是“江青要我”到矿业学院“去发动群众批判张霖之”的，（《戚本禹回忆录》522页）而他对造反派的幕后指挥，却只字不提。

很显然，将张霖之迫害致死，戚本禹绝不是单纯的执行者，而是幕后指挥者。戚本禹公然撒谎。

从江青1966年12月14日公开点名之后，“彭真死党”就成了我父亲的代称。萧某等人伙同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扣押、批斗、审问我父亲，逼供与彭真的“死党”罪证，妄图定成“铁案”。奇怪的是，无论是江青还是戚本禹，无论是在我父亲被冲击的时候还是被迫害身亡前后，谁也没有拿出“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任何证据！戚本禹洋洋数十万言的上下册回忆录，还用专节写张霖之被批斗致死，但是江青、戚本禹反复强调、公开号召造反派批判揭发的“彭真死党”罪名，究竟是何理由，有何证据，戚本禹却一字不提！

原因很明显：中央文革利用萧某的诬告信，把“彭真死党”当成打倒张霖之的“要害”问题；萧某借助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上位，投靠效忠，双方一拍即合。而张霖之为何是“彭真死党”，戚本禹根本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所以干脆不说。

1966年12月24日，戚本禹在矿业学院鼓动学生批斗张霖之：“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你们的炮火还不够猛烈，要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击”，“要狠狠地斗！”有学生当场问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供群众批判用，戚本禹答“材料你们自己找！”“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张霖之本人承认是“死党”。而这个“活材料”他们始终未能得到。这才是张霖之被毒打致死的真正原因。

戚本禹恬不知耻，称自己在矿院讲话中要求群众“要文斗”、“不要打人”，还说小报和记录上都“有我告诫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的话”。（522页）

“小报和记录”我不光看过，还保存着。上述戚本禹的煽动性讲话，就印在当年小报和讲话记录上，广为流传，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却一句也不敢提。任何有正常思维方式的人，读了戚本禹的回忆录，了解了他当年讲话的主要内容，结论都会是：“戚本禹之心，路人皆知”！

戚本禹不光在回忆录中回避张霖之致死的真实背景，还虚构了一个假的背景，就是张霖之因官僚主义严重，矿难频发，“民愤很大”被批斗而亡。

我父亲被江青公开点名为“彭真死党”，遭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拘押批斗。据戚本禹说，这之后中央文革开会，觉得批斗张霖之的火力还不够，群众仍然没有发动起来，“光说要斗，这没有用，得有人去具体执行”。于是江青要戚本禹去矿业学院“发动群众”。（522页）

在文革大背景下，一个所谓“民愤很大”的当权派，被江青公开点名，又被造反派关押审问批斗，却仍未激起“民愤”，还需要中央文革派出戚本禹去煽风点火，“民愤”何在？

为了给“民愤很大”圆谎，戚本禹继续用障眼法造谣：“起先在煤炭部和矿业学院斗争的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了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那斗争起来是毫不留情，矿院的学生根本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惨了，他确实是被打得很厉害的。”（522页）

戚本禹还假惺惺“内疚”：“我当时知道张霖之在底下民愤很大，所以应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组织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我没有这样做是我的严重失职。”（523页）

这一套以守为攻的“自责”暗藏玄机，是文革笔杆子戚本禹的看家本领。

戚本禹首先模糊时间概念，把张霖之遭批斗“比较文明”的阶段放到“一月革命”之前，让读者认为是“一月革命”开始后各地矿工参与进来，才开始了武斗。

戚本禹又公然撒谎，他用“自责”的口吻“检讨”没有派人去“控制武斗现场”，是“严重失职。”

实际上，我父亲受到所谓“比较文明”的对待，是他1966年12月19日主动到矿业学院接受学生批判，继而被扣押，到12月24日戚本禹矿院讲话的不到一周时间。他被关在矿业学院学一楼的一间学生宿舍，睡在双层床的下铺，四周都是看押他的学生。这期间

他尚能与学生展开对话，也接受询问和批判。他虽然失去自由，但没有受到殴打。这就是所谓“文明对待”阶段。

转折点并不是“一月革命”，而是12月24日戚本禹的到来。显然，江青、戚本禹对以前的那个阶段很不满意，才要进一步煽动批斗张霖之。戚本禹发表了“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击”的讲话之后，当晚对张霖之的批斗就明显升级。12月25日，煤炭部的萧某表示，戚本禹的讲话是“动员令”，“我们应该坚决响应”，“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11月4日）

从12月26日开始，我父亲被先后拉到煤炭部机关、煤炭文工团、煤炭科学院等单位游斗，遭受毒打。以下是1966年12月28日煤炭部机关批斗我父亲的实况：

萧某等人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彭真死党”，“张霖之同志大义凛然，光明磊落，拒不承认。这伙打手们立即扒下他的棉大衣拳打脚踢，倒剪双臂，强令下跪。”（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11月4日）“他们还拿了一根钉着大牌子的木棍插进衣领里，由于木棍上尽是刺，把张的耳朵和脸划破了，顺着脖子往下流血。”游斗一番之后“又回到院子里，脱下张的棉衣，架到一个小凳子上，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天气里只穿一件单衬衫和一件毛背心，站在寒风中被打得遍体鳞伤。”（摘自煤炭部机关工作人员亲笔证词）

此时，还没有所谓“一月革命”。

中央文革在煤炭部派有联络员，与煤炭部造反派头目吴某保持直接联系。斗争张霖之的过程都被拍照留底，通过联络员上报分管煤炭部文革运动的戚本禹。这些照片成为戚本禹幕后操作迫害张霖之的罪证。（杨克：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

戚本禹所谓“没有派人控制批斗现场”的虚伪“自责”，在上述照片面前原形毕露。

回顾当年对我父亲的大批判、大字报，所有焦点都集中于“彭真死党”、“污蔑毛主席是秦始皇”等莫须有的政治罪名。我父亲在各种会议上强调安全生产、质量第一的多次讲话，被摘录在各种大字报和造反派小报上，但那不是为了肯定他抓安全生产的努力，而是为了批判他“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比如，我父亲在1965年5月28日煤炭系统全国电话会议上讲话说：“质量是命根子，希望同志们像爱护生命一样地来爱护质量”；“质量不好，是要死人的。这点上请马克思保卫你，是不保卫你的。”造反派小报在这些话后面的批注是：“看，张霖之攻击毛泽东思想，真是无孔不入！”（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1967年1月28日第4版，《反党分子彭真的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的滔天罪行》）

如果我父亲真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置矿工生命安全于不顾的“民愤很大”的“死官僚”，为什么江青、戚本禹不以此为罪名，号召群众批斗张霖之呢？为什么在张霖之被江青点名打倒后，中央文革还要不断幕后策划、煽风点火，唯恐其“民愤”不大呢？为什么要捏造连他们自己也拿不出证据的“彭真死党”的罪名呢？

戚本禹谎言之三：对张霖之之死感到“内疚”——戚本禹在对张霖之之死假惺惺表示了“内疚”后，笔锋一转，紧接着写到文革中另一个老干部被群众在批斗中打死，“虽然随意

打死人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件事却是事出有因。”原来此人“禽兽不如”，文革前先后强奸了女学生和她的母亲。所以这件打死人的事情就不了了之。然后，戚本禹说：“我写到这里，一直有思想斗争。因为当年总理说，不再提这件事了。可我现在又提了。因为我考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揭露党内走资派，没让群众充分认识走资派的真面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大复辟的现状。”（《戚本禹回忆录》523—524页）

戚本禹不愧为“文革御笔”，这一段文章一箭双雕：把一个被称为“禽兽不如”的领导干部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与张霖之之死并提，其题目《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等人”就是指这个没有姓名的被打死但“事出有因”的人。此人为何与张霖之放到一起写呢？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死“事出有因”！先不说戚本禹提到的这件无名氏事件真假如何，但他在为张霖之之死“自责”后，立刻用暗喻的笔法将张霖之与一个“禽兽不如”的人并列，所谓“事出有因”，其实是死有余辜！天下有如此的“内疚”吗？

戚本禹接着点出“要害”：当年没有彻底打倒包括张霖之在内的走资派，才造成了今天“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大复辟”！

戚本禹被追捧者奉为“大帅”。果真，连其“自责”、“内疚”的笔法都无人能及。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张霖之做了这样一个评价：他“后来听说”，“张霖之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很勇敢”，“而且从个人品德来说，他也是比较正派的，除了吃吃喝喝，没有其他问题。”（523页）

一个对受害者之死表示了“内疚”的人，如此轻佻地评价受害者，这样的所谓“内疚”没有半分诚意。

戚本禹人格之低下，不在于他死守文革阴魂，而在于他巧舌如簧信笔由缰的习惯性狡辩和诬陷。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他在仅仅三四页纸中的谎言一一详尽驳斥，但读者可以据此衡量其全书的可信度。

比如，他为了塑造张霖之“吃吃喝喝”的形象，把萧某向中央文革状告张霖之说“毛泽东是秦始皇”的背景，从开会前的几个人闲聊改为“酒后谩骂”。（521页）在整个文革过程中，煤炭部各个时期不同的掌权者都对此案做过调查，但除了萧某一人坚持外，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旁证。（杨克：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

戚本禹还说，他看过张霖之的验尸报告，“身上有很多皮下伤，有青瘀血斑”，是“上吊自杀”。（《戚本禹回忆录》522页）实际上，我父亲死于被戚本禹挑动起来的近一个月的残酷批斗。当时在夺权高潮的混乱中，不可能认真、及时地查明真相，追究凶手。即使如此，我们看到的验尸报告也没有张霖之是“自杀”的结论。

文革后参与审判江青的特别法庭法官王文正，口述审理张霖之被江青迫害致死一案时说：“法庭接着投影1967年1月张霖之批斗现场照片和张霖之尸体检验的照片。”“张霖之的尸体检验照片更是惨不忍睹。只见他背部的伤口竟达三十多处，头部有一处重伤，其创深至骨髓。”（《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王文正口述，当代中国出版社，156页）

在当年电视转播中公诸于世的验尸照片，竟被戚本禹轻描淡写为“皮下伤”，转而污蔑张霖之“自杀”。

我父亲在被扣押后惨遭批斗时，曾在造反派监视下对冒险去探望他的女儿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绝不自杀！”这是他留给我们全家的最后遗言。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举行包括张霖之在内的八位逝世于文革初期的老同志的追悼大会。在我父亲的悼词中，有张霖之同志面对江青集团的残酷迫害，“以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顽强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样的评价，在文革遇难者的悼词中是罕见一例。这是对戚本禹的张霖之“自杀”说的彻底否定。

我为给父亲写传记，四处搜集他的生前史料，与当年一位曾在鸡西矿务局工作过的河北大学教师王春来有一段网上联系。他在2004年2月26日给我寄来一封用毛笔写的信，信中说：

“收到书和信后很激动，不怕你笑话，泪水总在眼眶中转。我并未见过霖之部长，但他直到今日仍栩栩如生地活在我的心中。因为他是我的老部长，六三年分配到鸡西矿务局干校，几乎天天说起这位部长，和他同时说起的还有黑龙江煤管局长李奎生，和他有过接触。他和霖之部长都是矿工的知心人。霖之部长的许多事，鸡西矿务局职工可说是家喻户晓传奇式的人物。由此可见——人间自有公平在。谁做了有益于百姓的事，人民总是铭刻心头的；但是谁玩弄了历史欺骗了人民，迟早要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没有例外。

光渝，你下手可能晚了些，致使许多宝贵的材料可能永远流失了。但没有关系，像我们这一代在矿务局工作过的人，霖之部长永活心中，和我们同归于了。能有几个领导人像霖之这样存活在职工们心中呢？”

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戚本禹回忆录》521页）。在我看来，这倒是戚本禹唯一一句赞扬我父亲的话。

戚本禹这位曾经的中办信访科长能看到大量一般人看不到的人民来信，并据此宣称张霖之“民愤很大”。但王春来先生这位之前与我素不相识，而且至今也没有见过面的煤炭战线老职工却与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看法相反。我相信，他信中所说的“玩弄历史欺骗人民”，“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人，就包括戚本禹在内。

□ 原载：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张光渝为该会初三2班同学）

~~~~~  
【档案解密】

对一份后文革年代资料的多重解读（三）

• 张 比 • 孙 耘 • 唐少杰 •

（续 z k 1 6 0 7 c）

三、读后有感 — 唐少杰



这个“资料及附件”（以下简称“这个资料”）大概是1983年至1984年“整党”活动的“清查”阶段关于清华文革的一份总结材料，亦即“清查”文革初期清华有关人物和有关事件的一份总结或汇报材料，也有可能是基于清华大学有关部门的“清查”报告而形成的类似“简报”或“情况反映”之类的材料。

这个资料的概括面相对集中，信息量比较凝缩，主要以表格统计形式出现的评述非常简练，包括1967年初至1968年7月底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诸多事件，基本上覆盖了清华文革两大群众组织各自相关人员的角色或“事迹”以及清华人员对北京和外地文革有关事件的参与等等，实质上，其蕴意内涵、其字里行间、其言外之意、其纸面之外的东西异常丰富、深刻、沉重和痛切。

这个资料的一大特色在于清晰地列出了清华文革初期两派群众组织领导人的问题以及这一时期清华所发生的相关事件责任人的问题，它很别致地用两个“附件”表格的方式，分别标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及其下属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简称“四派”）各自的上述问题。这个资料共涉及到84人，其中，涉及团派76人，四派8人。对于这个资料，前面发表的张比先生《记录在案：误入白虎节堂之后的黥面之刑》和孙耘先生《后文革史之一粟：对一份文档资料的解读》，都做了直切、细致和深刻的梳理，读后令人掩卷长思，唏嘘不已。

无疑，这个资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蒯大富的定性，把蒯大富的“主要问题”只用一句话来概括：“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大量犯罪活动”，这种说法在当时可能有随大流或迫不得已之嫌，但却颇为肤浅、谬误甚至不值一驳。显然，蒯大富到1968年7月底就已被逐出文革政治赌局，而到了1970年12月8日被隔离审查，他的文革政治生命也就寿终正寝。从整个文革历史来看，蒯大富与林彪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与江青等人的关系更是直接来自毛泽东及其文革的作用。林彪、江青集团作为两个集团的真正形成是在1968年夏季蒯大富政治上已不得势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实际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出现是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后才得以明确的。显而易见，蒯大富在文革的经历或遭遇（包括蒯大富的种种“罪责”）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比起与林彪、江青的关系来更为直接、更为重大、更为关键；甚至可以说蒯大富本人与文革伊始的刘少奇的关系都比他同林彪、江青的关系更为直切、更为厚重和更为凸显。说明这一点的一例，就是1980年代初在审讯蒯大富之际，蒯本人为自己遭受逮捕、拘押而喊冤叫屈，一位法院领导人直面“劝诫”蒯大富：“不抓你，全国各地那一万个‘小蒯大富’，我们就无法处理”（大意）。〔19〕由此，蒯大富的文革“主要问题”就不难“了然”。

这个资料的两份附表共分为八个栏目，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第五栏目“在该组织曾有的地位、头衔及其主要问题”和第六栏目“初步清理情况”。据我查阅有关档案的经验所知，这种资料的形成和提交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花费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一定是经历过大量的、甚至相当长时间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准备的过程，一定是经过持续不断的、多种形式的“磨砺”或“捶打”的，准确地说就是依靠并通过难以计数的相关的审查、审讯、旁证、互证、检举、交代、会议记录、简讯、简报、汇报、申报、批复以及一系列经常反复的讨论决议等等材料而“铺垫”或“充实”起来的。就我所接触到的材料，与这个资料提及的人员相关联的其他人的数目，远远超出这84位人员的数倍，换言之，那些超出这84位人员数倍之多的人士，不管自愿不自愿，都要卷入上述这种“铺垫”或“充实”的过程。据悉，1970年到1973年清华对同这些材料相关联的其他种种人士（例如，所谓“五一六分子”或其嫌疑者）“清查”或“调查”的数目就在400人以上。因而，所有上述这些“素材性”的材料，无论是它们的整体，还是它们的部分，不是更长、更广、更细，就是更为惊心动魄、更为刻骨铭心、更为撕心裂肺……

在这个资料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员及其“主要问题”，都分别是一部文革的独特故事，都各自凝聚一段当事人如泣如诉的文革非凡经历，都相应会给后人留下绵绵不断的思索和孜孜以求的探寻。迄今为止，对于所有这些“主要问题”进行彻底揭示、真正反思和总体把握，还做得远远不够。即使对于这个资料本身而言，也有着很大的不详或不明之处。例如，这个资料提及的团派全国联络站林×的“主要问题”，在当时甚至在今天的有关文革研究者那里，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或传奇因素。林×作为团派在杭州联络站的人员，于1967年夏季在杭州从浙江省公安系统的渠道得知了毛泽东正在巡视杭州和南方其他省市的秘密消息，随后以“跟踪毛主席所乘坐的列车”之“罪名”，被中共中央有关机构拘押、审查。后来，周恩来在1967年国庆节招待会上当面告知蒯大富，此案已由中央查办，不要清华插手介入。即使到今天，所有清华大学的文革材料都没有记载林×问题的细节和处理过程。而像林×这样为清华大学无法知晓或无能为力的清华文革个人案例处理，绝不只此一例。从这个资料林×一栏“备注”的注明（“因中办下达了复查结论文件，林×属于认识问题，故撤销记录在案的决定”）中可以得知，林本人的“主要问题”并不像当时和后来所传说的那样严重、那样神奇，尽管林本人为此而付出了他个人生活的沉重“代价”。进而，面对这个资料提及的所有人员的经历和问题，我要套用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一段话来加以延伸：一想到清华文革群众两派，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各有个性或特色，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不幸和悲哀……（2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关于清华1967年初至1968年7月底清华文革问题的资料，有一个时间上的例外，就是它并不一味限于上述这个时期，例如，在提及团派宣传部的“吴××”（即“吴炜煜”）（21）时，把吴本人的“主要问题”归为：一是1967年写了“三论”《清华党组织必须重建》的文章，二是1975年底至1976年写了“十论”《走资派还在走》的文章。其实，后一问题才是吴炜煜“得咎获罪”的主要理由。这些名噪一时的“十论”，给1975年底至1976年初迟群等人在清华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提供了重磅理论“炮弹”。而这个资料给吴炜煜所定的“主要问题”就是把吴本人在文革之初与文革之末的笔头“功夫”联系起来，从而“坐实”了吴炜煜为清华文革一大笔杆子的“定论”。

令我格外感慨的是，这个资料所提及到的一些团派人员，从1967年初至1968年8月之前，如此这般不遗余力地甚至“创造性地”进行整治或残酷迫害他人的活动，说他们有“罪”或为“恶”，并不为过。而在1968年之后，恰恰正是他们本人经受了绝不止一次一时一场的“清理”或“清查”，这些“清理”或“清查”毋庸置疑给这些有“罪”或为“恶”的当事人带来了无法言尽、直至终生的作用或影响。这又一次不禁使我仰天长叹：文革不仅仅要打倒文革的对象和消灭文革的敌人，文革最终一定要残害文革参与者本人、一定会吞噬文革的儿女、一定是使文革本身成为彻底异化的闹剧兼悲剧；作为曾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革命，文革演变为“比赛革命的革命”，直至完成了“革命的革命”！这里，我要不断反问和追寻的问题就是：文革最终给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文革参与者们带来了什么？

总之，这个资料作为追溯清华文革初期过程的一个记录式的缩影或侧影，它比较真切而又简短地折射出清华文革初期的历史之“面”、功能之“棱”、单位典型之“点”和代表人物之“角”。今天，基于把这个资料进一步结合到对于清华大学校史所作的通览和反思，我要呼吁的是：对于像清华大学这样一所中国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大学来说，再也不能致使诸如1957年数百名师生所遭受过的厄运、1966年至1976年成千上百的师生所经受过的灾难、1989年至今难以计数的师生所亲历过的悲剧之类的事情萌发、滋生或重演！

## ◇ 编者附记 — 孙怒涛

### 一、关于资料

资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附件 2、4 的表格。

在所涉当事人主要问题一栏中，内容多有不实，真假难以甄别。

这些不实之词，欲加之罪，正是有关方面构陷平民造反派的有力证据。但是一旦公开，也会给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所以，拟隐名处理。

即便隐名了，部分当事人仍坚决反对公开表格。不得已，这里只能刊发一幅资料正文的影印件。

真希望我的朋友们少一点个人的考虑，多一分历史的担当，摒弃派性残余，那样，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就会更深一层。

### 二、文革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文革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十年文革。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做大量深入的研究。

文革的种子早在文革之前就种下了。它可以追溯到四清、反右，甚至更久远。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初步。

文革结束了，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开始了虽然对文革有所清算但是仍有文革延续的后文革时代。对后文革时代的研究是文革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这份资料，源于文革时代，成于后文革时代。它显露和隐含的信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发挥着作用，影响着许多人。

如果这只是一份保存在清华大学档案室中的资料，可能就没有必要收录在文集里。问题是，这份资料已经上达中央一级的机关，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这样一份在内容上有不少言过其实、真假混杂、政治定性荒唐的资料，在高层部门显然是把它作为完全可信的档案材料在使用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上了名单的人都是犯了罪错必须严加控制的政治贱民。

“清理三种人”是全国性的运动。可以推断，全国主要造反派的资料也在高层部门保存着。有关清华两派的资料只是一个实例和典型而已。

我们对这份资料的多重解读，就是试图在新课题的研究中做一点探索性的工作。我们希望这一新课题能引起文革史研究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关注。

### 三、我对“荣获”“记录在案”的感言

我在榜上有名，这毫不奇怪。作为 4 1 4 的二把手，要是名单中没有我，反倒显得有点不正常了。

令我意想不到的，我的主要问题栏竟然是“未发现什么问题”。“清查516”运动审查结论中的那几点“错误”构不成问题，但“未发现什么问题”的我仍然被“记录在案”。

借主编身份之便，我对此谈点感言。

“记录在案”究竟是什么含义？我至今依旧懵懂。

谁记录的？记录什么？记录存在哪里？以什么形式记录？在什么时候记录发生作用？……没有一个问题我回答得了。当然，百度一百遍也没用。

我知道，犯法了有法律管着。不够犯法的可以按治安管理条例处理。党员犯了纪律有党纪约束。公职人员犯了错误有行政处罚。这些都是显规则。

还有大量的潜规则，那是一般不成文的但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规则。

“记录在案”显然不属于显规则，因为它并未公诸于世，也没有告知被记录者。“记录在案”也不能算是潜规则，因为它应该（尽管是我的猜测）有一套条文解决我没法解释的那些问题。只不过这套条文仅在某个部门某个级别的范围内是公开的，有关人员是按此操作的。

我把既不属于显规则又有别于潜规则的这些规则，称之为暗规则。“记录在案”就属于组织系统制定、执行的一套暗规则。

我在《良知的拷问》中写道：“即使（我的）所谓的交代材料、外调材料都烧掉了，甚至审查结论也烧掉了，我依然感觉到我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人。”（见P672）

几十年来感觉被打入另册，这只是感觉，没有任何证据。今天，当我看到这份资料，“记录在案”四个大字赫然入目，我才找到了我被打入另册的明证。

我多年的感觉并不是凭空臆想。因为有几次，每当到了有关我的前途事业的关键时刻，事情总会莫名其妙地朝着不利方向逆转。就像我在行进中被一堵透明的厚墙挡在前面，目标触手可及，但就是够不着。明明感觉到这堵墙的存在，却又说不清它是何物，来自何方。即使今天我知道了极有可能就是这个“记录在案”在作祟，我也无处可问，无人可问，无理由可问。

我真想知道，我的案卷中究竟记录了一些什么东西。难道就是“此人未发现什么问题”这句话？真要是这样，那就是说，我被“记录在案”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当过414的头头。也就是说，只要是平民造反派的头头，不管他们有没有问题，都要戴上“记录在案”的帽子。而高干子弟发起的造反派组织（如老红卫兵）的头头，其中更有些作恶多端的分子，不仅没有记录在案，还得到提拔重用。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出身论”吗？

作为个人，我们已经能够以豁达平和的心态看待曲折多难的人生。但是，我们必须拷问历史，到底出于什么目的硬要以“记录在案”的卑鄙手段在政治上毁灭我们这一大批人？

注释：

- 1、陈楚三：关于红卫兵的——桩历史公案，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
- 2、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党组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中组发〔1983〕6号文件，1983年4月23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3、唐少杰：清华文革“非正常死亡”现象评析
- 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3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5、王克斌：鬼门关下的徘徊——被遗忘的516，清华校友网1964级社区
- 6、“中央决定给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摘帽，对地富子女的成份也作了明确规定”，1979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 7、赵艳来：“揭批查”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2009年
- 8、中共中央关于慎重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1978.08.13；中发〔1978〕48号
- 9、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总结报告》的通知，1988年2月12日，中发〔1988〕2号
- 10、一丁：文革后河南的“揭批查”运动，网文，见如下网址：  
[http://a.lasphost.com/chinatownbbs/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21](http://a.lasphost.com/chinatownbbs/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21)
- 11、中共中央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82.01.31，中发〔1982〕9号
- 12、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12月修订版
- 13、陈云：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 14、陈云：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 15、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整党通报》〔文件〕第4期
- 16、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之三，米鹤都编撰，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
- 17、取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18、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
- 19、唐少杰对蒯大富的访谈，2010年1月19日，深圳。
- 20、参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卷首题头词，董乐山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歌德的原话是：“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
- 21、吴炜煜已于2013年病故，生前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退休教授。

（连载完）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各抒己见】

我们今天怎样看待文革和毛泽东？  
——王希哲答香港明报记者刘利问

• 王希哲 •

◇ 一题：我们今天怎样看待文革？

历史发生的事实是不变的，回头对历史的省视和解读，则总是现代眼光的。从现在中国社会的问题看，文革的宗旨是有它的伟大历史意义的。毛泽东文革的目标，是要让人民自己起来，反对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沦为西方强势国家的附庸，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革命后变质为欺压民众黑暗社会的的特权官僚和买办大资本家。他的忧虑在今天中国几乎全部演变为现实且极其严重。完全持客观的眼光，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文革的宗旨还真不错的。

不少人否定文革，总是罗列文革时期发生的许多黑暗事件。确实，许多黑暗事件发生在文革中。但这些黑暗事件的发生与文革的基本宗旨和路线之间，没有必然性。这些黑暗事件不是文革本身，甚至是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打文革旗号对文革的偏向和搅局。89反腐败民主运动，是文革民众运动的延续。没有文革就不会有89运动。那期间，发生了类似黑暗事件了吗？没有。89爱国民主运动是一场极其文明和有自觉秩序的大规模民众运动。邓小平却以“文革动乱又来了”为借口，血腥镇压了它。于是中国不能再有任何的民众运动了，只要有了任何维权民众运动的萌芽，“文革动乱”“文革余孽”“文革翻案”的帽子就扣上来了。你是“民主派”，如果你自己也跟着共产党右派官僚及其利益群叫喊“彻底否定文革”，你还有什么话说？你已经被剥夺和自我剥夺了任何为民众运动的发生辩护的话语权了！但民众的维权运动在今天最坏的官僚资本主义无节制肆虐的中国，实在是太需要了。而这只有为文革的基本宗旨翻了案，反了正，去了妖魔化，才能首先精神上解放了中国人民，才有可能第二次的更少有黑暗面的“89民主运动”。希哲最近呼唤“放手让全国人民来“反思”文革，以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正是为此。

◇ 二题：对“李一哲大字报”

“李一哲大字报”发生在70年代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后。那时，中央文革在毛的支持下以批判林彪“右”为名，路线愈趋极左，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越来越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抵制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的解放，干扰了周总理领导下的国民经济的整顿、恢复、发展和“四个现代化”。这就引起了人民群众普遍对中央文革甚至对毛泽东的不满。我和当年广州十七中学《井冈山公社》的同学们对此深刻感受，特别是在上山下乡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后，感到那时中国路线的主要倾向不是右，是极左了，应该纠左。而要人民敢于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提出批评意见，就需要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来保障，不能“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总结归纳了文革中发生的大量黑暗面的教训，我执笔，以“李一哲”笔名写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建议信，再一年，1974年加序言以大字报闹市贴出，被中央文革和广东省委打成了反动思潮和反动大字报（后打成“反革命集团”入狱），组织数百万人批判围攻，轰动了广东，全国及至香港和海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一哲平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口号被中共采纳为基本国策。但也因此，文革中原红旗造反派的“李一哲”，从此被人们视为“右派”。但不要误会了，李一哲并没有反对和“彻底否定”文革，而是主张“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进行文革。赵紫阳在89天安门广场上提出了一样的主张。广东的批“李一哲”正是赵紫阳领导的。

李一哲大字报最后一句是这样的：“我们深信，一个……群众运动的高潮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基本精神，并且发扬光大。”

至于问到李正天。我与他没有什么“恩怨”。当初他偶然的原因介入了“李一哲”，一起受到了打击，罹难。但我们必须为后来的李一哲研究者留下完全客观的资讯：李一哲核心成员原基本是王希哲领导的《井冈山公社》骨干；李一哲署名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是王希哲执笔。“序言”由王希哲委托郭鸿志初稿，王希哲改定。除了大字报原稿最后一部分曾出自李正天后来王希哲交陈一阳全部改写之外，李正天在大字报中没留下一个字。李一哲平反后，李正天向习仲勋表示：“李一哲解散了。不存在了”。王希哲不同意。他对习仲勋说：“不。李一哲存在。李正天可以退出李一哲，王希哲将继续举着李一哲旗帜前进。”。

### ◇ 三题：如何评价毛泽东

这是个历史的大题目。只能由历史来回答。前面我谈了我对文革基本宗旨的肯定，这里只谈谈我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一些不赞成的意见。这些意见，中国的左派们是能够确认王希哲是右派的。去年王希哲在曼谷召集的国是座谈会上，著名左派领袖秋石客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希哲最赞成的，是抗战初兴，共产党向全国宣言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这不是“策略”，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规律学说的。但在中共取得政权后，还未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便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革资本主义的命了。比如土地，他夺自地主分给了农民，又立即开始了不断地集体化。用今天的自由派例如胡平的说法，毛泽东欺骗农民，一手把土地给了农民，一手又夺了过去。不是的，这太肤浅。因为毛泽东很快发现，一旦土地分给了农民，农民将迅速分化，农村干部和强势农民中，“刘介梅”式的新地主将大量出现，重新盘剥压迫分到手又卖去土地的弱势农民。千年农民革命的历史在共产党这里又来一个循环。革命白革了。这趋势无法避免，出路只有集体化（当然还有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市场问题等），即将农民组织起来，将其手中分散的土地，再集中起来。也就是说，毛不能容忍革命后新地主的再出现。而邓小平后来的改开，恰是能容忍新地主（先富）的出现。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区别很重要的就在这里。

但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是跃不过去的规律，即新地主新资本家出现是必然的，又怎么办呢？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办法就四个字：“节制资本”，以利和发展民生，这最恰当。但毛泽东却希望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使其尽快“绝种”，邓小平特别其后人则对资本主义完全纵容，无限开放，不作节制。因此，邓小平的“共产党”比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更右倾了。

毛泽东文革的反资本主义基本路线特别是被中央文革极端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政策，是王希哲不赞成的。这个意义上说，王希哲是在根本上否定文革的。

第二个不赞成是，即便反对资本主义，党内外主张“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却把它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将文革规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老王指出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规定包含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基本内在矛盾和冲突，就是，“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向走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当权派夺权”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政治斗争和革命，却又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也就是只能在共产党专政的统治体制内进行，不得对共产党统治体制本身挑战。但任何有机

的运动，一旦被它的发动者发动起来，就获得了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道，它就必然要与发动者原来的主观框框，不断发生严重的碰撞。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特别是造反派的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基本的内在矛盾冲突之上。

这个一说就长，无法再展开了。

第三个不赞成是，毛泽东文革只强调“革命”。想象在他身后，一旦出现中央的修正主义，经过了文革“演习”的他的忠实革命后人，就能敢于起来造反，再革命，“重上井冈山”。这是很误人子弟的，很误今天的激进“毛派”的。毛泽东声称文革他要发起一种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大民主，但整十年空言革命，从未致力规划和建设一种真能在他身后，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具体可遵循可操作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制度。这才是人民民主的根本的保证。但毛泽东没有真正用力去作。这一点，正是今天的中国毛左派陷入了进退两难极大困境的根源。

但无论如何，毛泽东作为革命得天下后的最高统治者敢于鼓动被统治的人民大规模起来向自己的国家机器造反，空前而绝后。无论各派人物猜测其动机如何，当然有利中国历史进步。毕竟，没有1966年毛泽东企图变革中国社会的“第一推动”，就不会有文革十年中国人民政治逐步觉醒成熟的实践条件，就不会有后来的“四五”，不会有后来的民主墙和波澜壮阔的89民主运动，并影响永远。文革，将人民的民主运动深入人心，只有一切社会的腐败层才害怕它。一个国家经常涌现的民众运动，是这个国家生命力旺盛的表现。它能培植和凝聚社会的正气，提升国民道德，抵抗和荡涤各种的腐朽乌烟瘴气，它能提醒国家的未来——青年们记住，除了吃喝玩乐和性欲，还有国家社会的理想和责任。

□ 原载《明报》2016年6月12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